

八十年代國際牌局的展望

尹慶耀

大致說來，在六十年代的「對抗時代」，中共「一條鞭」式反美；進入七十年代的「談判時代」，中共急遽與美國勾搭。這在它說來，是靈活的策略運用。可是，別的國家如何可能跟隨它迅速轉身？

就是在七十年代，中共也前後有別。由於六十年代的「造反外交」，使它在亞、非、拉丁美洲都遭失敗。七十年代初它開始討好不結盟國家，希望在第三世界「收復失地」。一九七四年春「三個世界論」的提出，就是證明之一。那時候，中共是反蘇重於反美了。顯然，若干共黨國家，不會同調中共。那些和美國尚處於敵對狀態的共黨政權固不必說，就連阿爾巴尼亞這個中共的長期夥伴，也對北平改變了態度。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阿爾巴尼亞的「人民之聲報」(Zëri i Popullit)發表社論，題為「革命理論與實踐」，指摘中共的「三個世界論」對「開發中」世界、「南北」世界、不結盟世界等等的劃分法不當，認為那是違反了馬列主義原則，模糊了階級鬭爭的立場。社論指出，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個原則，不能適用在兩個帝國主義超級大國——美蘇問題上。因為任何帝國主義，就其本質來說，都是無產階級的粗暴敵人。從世界革命的觀點看來，把帝國主義分成比較危險的和比較危險少的，那是錯誤的。爲了對抗一個超級大國，而和另一個超級大國握手，將會招致悲慘的後果。阿爾巴尼亞不僅在理論上抨擊中共，在國內也整肅中共派。當狄托訪問中國大陸時，阿爾巴尼亞更有一些破壞性的行動，迫使中共於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三日，斷絕了對阿爾巴尼亞的經濟援助並撤走在阿專家①。

註① 鄧小平稱，從一九五四年起，中共提供阿爾巴尼亞的援助在四三億美元以上，有六、〇〇〇華人參加阿爾巴尼亞的國內建設，中共自己鋼鐵不夠用，還向阿爾巴尼亞提供了一〇〇萬噸以上的鋼鐵。

「三個世界論」的提出，顯示中共把統戰活動的重心放在第三世界上。但是，由於蘇聯勢力在亞非地區的迅速擴張，以及它對中共逐漸形成包圍之勢，迫使中共於一九七八年後半，將其外交活動的重心暫時移向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中的美國。同年八月中共與日本簽訂「和約」，十二月與美國商定建交，就把「反蘇的責任國際化」。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所長歐尼爾 (Robert Oneil) 說，一九七八年以降，中共對於同蘇聯的戰爭不可避免警告，實質上業已消失。中共認為它已不再受蘇聯的直接威脅^②，或與上述種種有關。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以降，阿富汗牽制了蘇聯十萬大軍，也升高了莫斯科與西方的對抗，中共就樂得脫身，在對外鬭爭方面另作部署。

中共也承認外交是內政的延長^③。一九七八年二年中共再度提出「四化」及「十年經濟規劃」，執行未久即遭遇困難，於一九七九年春即進入經濟調整期，但中共並未放棄現代化目標。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幹部會議上，鄧小平提出八十年代中共的三大任務：(1)反霸，(2)統一，(3)現代化。八十年代的中共，就朝向這些方面努力。

二

一九七九和一九八〇年，國際局勢中有一些關鍵性的事件發生。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訪問美國，歸途在日本停留，目的在建立「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他在美國時，直言不諱的要求美國、日本、西歐和中共共同抵禦蘇聯。就在那一年，卡特總統改變了美國禁止出售具有軍事潛在用途的設施給中共（一九七二年以前一直堅持此一原則）的態度，以個案為基礎，允許出售禁止賣給蘇聯的軍事與商業兩用的技術給中共。一九八〇年一月四日，即美國政府宣布對蘇聯入侵阿富汗直接進行數項制裁措施的同一日，卡特作了兩項決定：其一是某些商業和軍事兩用的技術售給北平，將成爲一種常規，而不再是根據個案考慮的事件，這可消除許可證方面的繁雜手續；其二是取消對中共購置某些軍事項目的嚴厲限制，這些項目包括卡車、超地平線雷達、通訊設備、直昇機及其他經特別設計供軍事用途的項目^④。就在同月上旬，美國國防部長布朗 (Harold Brown) 訪問中國大陸，提議出售一套美國高級技術的通訊衛星地面接收站給中共。

美國如此改變對中共的態度，是出自阿富汗事件的刺激。當時卡特的「國情咨文」和布朗的「國防報告」，都提到期待日本加強防衛力量，美國駐日大使曼斯菲爾德更具體向日本鈴木內閣建議，把五年防衛計劃縮短在四年內完成。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

註② 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五月七日）第二面。

註③ 參閱中共：〔新名詞辭典〕（上海：「春明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〇〇七七頁。

註④ 季耶林 (Philip Geyelin)：「美國目前不會出售武器給中共」，原載〔華盛頓郵報〕，臺北：〔中國時報〕（一九八〇年五月廿五日）第二版譯載。

會在一次辯論會中，有人認為：「如果說，今後五年之間能對自由世界作出最大貢獻的是什麼，那末無他，就是日本防務費用的增加」。香港「文匯報」在一篇社論中，引述了這些話，又繼續申說，今後五年將是戰爭危機最嚴重的時刻，亞洲的中東、東亞，將是最易點燃戰火的地區之一，設若日本的軍力足可與「中國」一起形成東方的反霸屏障，與西歐遙相呼應，使美國可在世界各地靈活策應，則制止戰爭的可能性將大為增加^⑤。

當時，中共對日本重整軍備一事，與美國態度一致。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一日，中共「國防部」副部長粟裕在北平「人民大會堂」會見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戰史部第一戰史研究室室長岩島久夫及防衛大學講師土井寬，他聲言像日本那樣富裕的國家，將防衛經費提高到國民總生產（GNP）的〇·九%以上來加強軍備，應該是可能的^⑥。四月廿九日中共「副總參謀長」伍修權與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中曾根康弘會談。伍修權說，美軍撤出日本，對亞洲是不利的發展。又說，中共贊成美國與日本軍事同盟，同時，美日安全條約「對東亞的和平與穩定是有利的」^⑦。關於日本軍費問題，伍修權對中曾根說：日本在技術和財政兩方面，都具有在質、量雙方加強（軍事裝備、自衛隊軍力）的條件。他強調說，依他個人的意見，日本的防衛經費由國民總生產的〇·九%提高到二%，對日本經濟也不會有多大的影響^⑧。與軍事扯不上關係的鄧穎超，也於五月十三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由牧野可視率領的日本主婦聯盟代表團時，大吹其日本軍事增強論。

當時蘇聯不斷抨擊美、日、中共在搞三角軍事聯盟。但日本不願給人以此的印象，其國內反對增強防衛經費者大有人在，因此對伍修權的談話頗多反感。當時的外相大來佐武郎於同年五月九日在日本眾議院沖繩北方問題特別委員會答覆有關伍修權談話的詢問時，就(1)日本不做軍事大國及(2)保持必要的防衛力量等基本方針加以說明後，聲稱：他國不了解日本的國民感情和戰後的發展經過，輕言提高防衛經費乃是「干涉內政」^⑨。

在美國的東亞戰略中，朝鮮半島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中共內心裏也許希望美軍繼續留在南韓，只是口頭上絕對不能如是說。一九八〇年四月廿一日，鄧小平接受「美亞新聞」特派員文明子（全美女記者俱樂部訪問中共代表團團長）的單獨訪問，對於卡特倡導的南韓、北韓、美國、中共舉行「四方會談」，鄧小平表示反對。他說，如果想比較圓滿地解決朝鮮問題，美國不妨與「

註⑤ 「日本醞釀重整軍備」，香港：「文匯報」社論（一九八〇年七月三十日）第二版。

註⑥ 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四日）第一面。

註⑦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年四月三十日）第一版。

註⑧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六日）第二面。

註⑨ 日本：「產經新聞」（一九八〇年五月十日）第一面。

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北韓）接觸。他表示駐韓美軍向後撤退幾百公里（指撤往日本或沖繩美軍基地），不會削弱美國在亞太地區對抗蘇聯的軍事力量^⑧。足見中共爲了向北韓交待，不得不要求美軍撤出南韓，但不希望它撤得太遠。

三

中共在大搞「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同時，却又與蘇聯圖謀緩和緊張。這是典型的共黨兩面手法。

一九七九年六月，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的劉平，隨同中共對外貿易代表團赴蘇參加貿易談判，並作了一些訪問活動，八月十三日返平後，曾在一次小型座談會上講話，將蘇聯情況作了一次簡報，也發表了一些觀感。九月間中共「全國蘇聯文學研究所」在哈爾濱召開「全國第二次現代蘇聯文學討論會」，會議紀要中談到蘇聯社會制度等問題。同年底在黑龍江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發行的「百家文藝」雜誌上，發表了以「關於布里茲涅夫時期文藝政策的若干情況和看法」爲題的論文。又曾任中共駐莫斯科「大使」，回平後轉任「外交部」副部長再率團赴蘇從事關係正常化談判的王幼平，返回大陸後在一次駐外使節會議上講話，也談論了蘇聯，後經香港「廣角鏡」雜誌發表（一九八〇年四月六日）。綜合該等文件，可以發現：(1)中共對蘇聯的政治、經濟有了肯定的評價；(2)中共將蘇聯的內政與外交分開，指其對外實行侵略、擴張政策，推行霸權主義，但在內政方面，蘇聯仍是社會主義國家；(3)透露蘇聯也將中共作社會主義國家看待。

當時，國外的報章也有近似的報導。例如，「紐約時報」刊載包德甫（Fox Butterfield）的一篇特稿，透露中共當局向其幹部們傳閱一份內部重要文件，它是總結中共「社會科學院」智囊團的總辯論，提供鄧小平參考的。文件認爲蘇聯的主要生產工具仍掌握在國家手中，它不是修正主義，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該文件說，目前來自蘇聯的主要威脅，是它的軍事擴張主義^⑨。「日本時報」的報導說，中共和蘇聯似乎正努力尋求有限度和解，縮小兩國內政上的歧見，但在對外政策上仍然強烈對立。

中共想在兩個超強之間尋求平衡關係，一如美國之聯中共和蘇聯。該報也引述中共一份文學雜誌的評論，認爲儘管蘇聯執行侵略性的對外政策，其內政在本質上屬於社會主義，蘇聯經濟、科學與技術有重大進步，人民生活有改善。該報稱，據中共方面人士透露，鄧小平與美國和解，招致曾在莫斯科受訓的官員的批評。最近一個中共專家代表團赴莫斯科商談貿易協定，歸來報告說，蘇式極端中央集權化的經濟規劃效果非常好。此一報告被反對者用以反對鄧小平四個現代化所使用的中央計劃與地方自主混合的策略。有限度改變對蘇關係，是鄧小平對此一批評加以容忍的表現。該報說，另一方面，中共反對蘇聯的擴張主義一事並沒有

註⑧ 日本：「朝日新聞」夕刊（一九八〇年四月廿三日）第二面。

註⑨ 「紐約時報」（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日），第三頁。

放鬆的跡象，但目前意在降低衝突。該報判斷說，無論和解遙遠到何種程度，但北平似乎相信蘇聯入侵阿富汗，不是針對中共，否則和解跡象不會出現得如此快速^⑭。

不管出自什麼原因，但自一九七九年以降，正如同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古杜希尼科夫（L. M. Gudoshnikov）博士所說，在中共內部「蘇聯修正主義」一詞已經消失；在官方場合，這一個名詞也不大使用了^⑮。從此，以「反修」為主的「文革」色彩完全消褪，對於北平與莫斯科關係的改善，也就少了一重障礙。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九日中共通告蘇聯，將雙方副外長級關係正常化談判（一九七九年十月在莫斯科開始，第二輪應在北平舉行）無限期延期，直到蘇軍撤離阿富汗再行恢復。不過據前引「日本時報」報導，實際上中共和蘇聯正在圖謀緩和關係。該報列舉的跡象是：(1)同年二月廿三日中國大陸各省在蘇聯陣亡將士紀念碑前放置花圈，是以往所長久未有的事；(2)三月廿日蘇聯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司長卡比察（Mikhail S. Kapisa 中共譯賈丕才，現已升任副部長）以解決蘇聯駐平使館內部事務為名飛抵北平，廿五日曾與中共「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于洪亮（現亦升任副部長）會談三十分鐘。此外，四月九日據「法新社」發自北平的報導，北平「市政府」已下令將蘇聯大使館所在的「反修路」改名，稱為「東直門北中路」，又將舊使館區所在的「反帝路」，恢復其原名「東交民巷」^⑯。表面理由是要掃除「文革」遺跡，如果你想到中共和蘇聯之間的「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於同月十日日期滿並不再延長，就領會到道路改名為什麼偏偏選在那個時候了。

四

變化最大的是一九八二年。不論布里茲涅夫是鑒於自己年老多病，願在生前看到蘇聯同中共的關係趨於穩定，還是由於當時蘇聯在外交上絕對孤立，願從對中共關係方面找尋突破口，但同年三月廿四日他在塔什干的講話涉及同中共的關係時，既肯定中共內部社會主義體制的存在，又完全承認中共對臺灣擁有主權。因為他的態度與以前不同，中共也作了不同既往的反應。同年九月中共召開「十二大」，就在黨章中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九月一日胡耀邦在大會中報告說：「中國決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中國的對外政策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為基礎的，是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的」。

註⑭ William Sexton, "Glacial Sino-Soviet Relations Turn Frosty", *Japan Times*, April 23, 1980.

註⑮ 古杜希尼科夫接受日本共同社記者訪問時的談話，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五日）第七面。

註⑯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一日）「縱橫談」欄。

每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都應該是獨立自主的。中共於此時強調此一政策，可從前引胡耀邦的話中體會出其真諦。那就是在美蘇之間保持某種平衡，說詳細點，就是接受蘇聯的修好，但不再作蘇聯的附庸；接受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援助，但不為其政策所左右；在第三世界中強調獨立自主，更可鼓動它們反對兩霸。更重要的是絕不放棄共黨的基本立場。

西德對外政策協會出版的半月刊「歐洲文獻」一九八三年第十七期（九月十日出版），刊登了約阿希姆·格勞比茨撰寫的一篇文章，題為「中國（共）對外政策重點的變化」，其中大意說，自一九八二年以來，中共對外政策重點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其表現為：對蘇恢復對話，對美保持一定距離，積極加強同第三世界的關係，重提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危險^⑮。筆者認為這項說法大致無誤，除了對第三世界關係非本文討論範圍外，其餘各點均與玩牌有關。

安德洛波夫政權，承襲了布里茲涅夫的對中共政策，在作法上更顯得實際而積極，而年來莫斯科和北平在實務關係上確實有不少增進。例如：人員的交流（包括互相交換十名留學生，今後仍將增多），邊界貿易的重開^⑯，體育、文化團體的往來，一九八三年十月六日廿名俄人組成的旅遊團到達中國大陸，十一月間中共一個觀光團赴蘇，乃十八年來所未有。重要是貿易往來，目前中共與蘇聯的貿易不大，但成長迅速。一九八三年三月，雙方商定將本年度貿易額提高為上年的百分之一百七十左右，達到八億美元。

前曾提及中共和蘇聯於一九七九年開始的關係正常化談判，因阿富汗事件而中止。現今蘇聯雖無自阿境撤軍的跡象，但談判已於一九八二年十月恢復，中共雖故意稱之為「磋商」以沖淡其意義，但實質上仍為副部長級談判，所談內容仍係關係正常化，並未降低談判層次。

中共和蘇聯的第三輪「磋商」於一九八三年十月六日開始，並於廿九日發表「新聞公報」，聲稱雙方在平靜、坦率的氣氛中，就關係正常化問題交換了意見。雙方認為磋商「有益」，並商定第四輪「磋商」將於一九八四年三月在莫斯科舉行^⑰。

第三輪「磋商」過後，中共首席談判代表錢其琛（中共副外長）曾對日本「時事通訊社」代表團（團長為該社社長大畑忠義）談稱，「磋商」期間，「蘇聯一再建議將水平提商，這項建議值得研討」，他透露蘇聯希望由高於副部長的政府高官進行磋商。錢其琛又說：「蘇聯建議兩國外長在聯合國見面，關於此點，雙方意見業已一致，今年雖沒有實現（葛羅米柯因韓航客機事件未出席聯大——筆者），但這不是說今後也不會實現」。他又透露蘇聯在磋商中提議在邊界地區採取「信賴釀成措施」，其具體

註⑮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日起）曾予摘譯連載。

註⑯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蘇恢復在新疆霍爾果斯口岸交接貨物。香港：〔文匯報〕（同月十九日）第一版，附有交接儀式圖片。另一交接站為吐爾戈特。

註⑰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十月卅日）第一面。

內容爲：(一)邊界地區移動軍隊時，事前通知對方；(二)舉行軍事演習時，相互接受對方的監視^⑧。在磋商中，蘇聯建議雙方在上海、天津及列寧格勒、基輔互設領館^⑨。另據其他資料，雙方於磋商中決定將明(一九八四)年度的往來貿易額提高到今年度(八億美元)的兩倍，並增進文化、體育等各個領域的交流，由雙方相關部門作具體商談^⑩。雙方在會談中討論過邊界撤軍問題，中共還要求蘇聯削減它在亞洲地區配置的SS 20飛彈^⑪。蘇聯特使伊里切夫則向中共表示，中共購買美國的防衛武器和軍事技術，將使有關蘇、中(共)共同減少邊境駐軍的討論複雜化。中共則聲稱它不會向美國購買大量軍火^⑫。

一九八三年九月三日，莫斯科廣播電臺，轉播了安德洛波夫答覆蘇聯「真理報」記者的談話。安德洛波夫說，「蘇、中(共)關係的良好發展，不僅有利於我們兩國，而且對整個國際局勢來說，一定有好處」。值得注意的是該臺觀察員所加的評論：

近二十年來，蘇中(共)關係的情況不能認爲是正常的。要知道，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有七千五百公里共同邊界的兩個鄰國，認識這個情況，就應當督促它們搞好彼此間的接觸，何況它們有能互相充實的經濟。蘇聯是工業高度發達的國家，能向「中國」供應現代化的工業設備和技術，「中國」人民的經濟現代化又是何等需要它們。與此同時，我國(蘇聯)經常向國外大量購買礦物原料、農產品和「中國」希望銷售的紡織品。兩國原則上相似的社會制度，不會造成對抗性矛盾，這一點也很重要。過去，我(觀察員)指的是五十年代中，蘇中(共)兩國曾經有很密切的貿易經濟關係。不但如此，兩國還簽訂有一九五〇年的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一些全面合作的協定。「中國」現在高度評價「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經濟成就，這同我國對「中國」人民社會經濟進步的各方面援助是分不開的。這一切意味著蘇中(共)的睦鄰關係不僅可能，而且有現實的基礎。現在當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經濟危機，和西方市場減少進口「中國」商品和壓低價格的時候，「中國」加強同蘇聯的合作，特別有好處。要知道，我國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因此和西方國家不同，能夠同「中國」按照互助的長期決定來發展合作。

以上所引，是近來所罕見的論調。趙紫陽的確曾對中共第一個五年計劃加以讚許，伍修權在回憶錄中對「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給予很高的評價^⑬，可知莫斯科電臺觀察員的話是有根據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三輪磋商中討論過蘇聯協助整修它於一

註⑧：(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日)第一版。(日本：「朝日新聞」)同月一日)第七面。
註⑨：(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日)第七面。
註⑩：(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十月廿九日)第五面。
註⑪：(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日)第五面。
註⑫：(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一版。
註⑬：伍修權：「在外交部八年的經歷」一文中指出，該約是在打消蘇聯對中共的懷疑(走南斯拉夫道路)之後簽訂的，它不僅對於締約雙方，對於當時的遠東及世界形勢，也是有著重大意義的。該文從一九八三年八月廿二日起在香港「文匯報」上連載。

九五〇年代協助中共建造的四家工廠。現今中共工業設備的百分之七十都是五十年代蘇製的貨色，中共無力全部換新，整修舊廠比較便宜，它不會拒絕接受。但與此相關的將是留蘇或受蘇聯訓練的經技幹部必將得勢，而蘇聯經濟模式的影響力必將加深，雙方的關係也就會日益接近。

蘇聯擬在實務關係方面逐漸拉近中共，中共則堅持應先排除障礙，但並不拒絕增進實務關係。按中共所謂「關係正常化三原則」，即柬埔寨、阿富汗兩問題和蘇聯從中蘇邊境撤軍的問題（亦即所謂三大障礙）。據蘇聯「東方研究所中國室」主任杰柳辛對日本「讀賣新聞」特派員小島談稱，他不認為那是正常化的障礙。在柬埔寨和阿富汗兩問題上，「中國」方面實際上也許感到不安。但是，正像安德洛波夫講的那樣，蘇聯的立場是，不犧牲第三國的利益。如果「中國」要求蘇聯停止對越南的援助，那麼蘇聯就可以要求「中國」斷絕同美國的關係。但是蘇聯不會提出這種要求。「中國」方面提出的要求按買賣人講叫「謊價」。杰柳辛說明在阿富汗問題上，蘇聯政府沒有讓步的餘地，中蘇邊界撤軍，已成「交易」的對象。對於雙方會談問題，杰柳辛說，「中國」提出的許多問題，都屬於只有通過「秘密」的外交談判才能解決的問題。兩國已經在就不損傷第三國威信的微妙問題進行著會談，對此大肆張揚是無益的。重要的是談判在進行，雙方都不希望決裂。這是兩國關係發展的特徵。對於兩國共黨大國關係最終要達到的程度問題，杰柳辛說：「我認為國家關係已經正常了。因為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從邏輯上講，下一個階段是確立兩黨的接觸。在這方面有許多應該解決的問題，但是，許多過去曾經是激烈爭論對象的意識形態上的問題，實際上是已經消失了」^②。

五

隨著中共和蘇聯關係的變化，中共對美日關係也發生了變化。

雷根總統競選演說中的某些部分，曾受到中共的攻擊，不過，他一當選，那項攻擊也就停止了。本來，美國同中共的戰略利益這項觀念，始自卡特政府時期。雷根任內的海格國務卿，仍然承襲並固執著這一觀念。他於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四日訪平，其時傳說美政府將修改限制對中共貿易的法律，撤銷向中共售賣武器的限制。海格重申，美「臺」關係仍然是非官方的關係。

一九八二年三月的布里茲涅夫塔什干演說，被美國助理國務卿何志立(John H. Holdridge)指為是企圖利用美國和北平關係的緊張，使北平和美國的西方盟國對華盛頓可能走的方向發生疑慮^③。在上述各種因素影響下，同年四月五日雷根總統有函分

註②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八日）第二版。

註③ 臺北：「中央日報」（一九八三年三月廿六日）第一版。

別給鄧小平和趙紫陽，同一天海格邀見中共駐美「大使」柴澤民，可能就是柴某轉交該等函件。五月三日雷根又有一封信託副總統布希帶到北平面交胡耀邦。這三封信於布希訪問大陸離去之前即五月九日由其助理人員在北平公布。三函內容都冠以「戰略利益」論，其重點是：(一)對去(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葉劍英的「九條和平統一建議」表示「歡迎」；(二)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不允許美國人民與臺灣人民之間的非官方關係削弱我們對這一原則的承諾」；(三)討論解決對臺灣軍售的辦法。布希帶回華府的中共三項要求：(一)美國對中共友誼的考驗，將由其是否終止、或繼續對臺灣的軍售來決定；(二)美國必須使其臺灣政策和其與中共建立友誼的願望一致；(三)美國的政策和行爲必須與雷根給「副主席」鄧小平、「主席」胡耀邦和「總理」趙紫陽的三封信所表示的感情相一致²⁰。當時中共態度蠻橫，不時以關係倒退等詞句對美施以恫嚇。一九八二年「八一七公報」發表後，中共對美仍然採取高姿勢。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六日舒茲接替海格出任美國國務卿後，美國對中共政策雖無劇烈改變，但對中共在國際舞臺上所能扮演的角色似已加重估，「戰略利益」已不若以往那樣強調。一九八三年二月舒茲訪問過中共。同年十月，中共外長吳學謙訪問了美國，一九八四年雷根將與趙紫陽互訪。今年十一月間雷根訪問日韓，美國總統助理兼總統辦公廳副主任迪弗於同月十四日晚抵達北平，安排雷根往訪事宜²¹。

一九八三年五月下旬，美國決定放寬對中共科技轉移的限制，把中共列爲「友好、但不結盟」的國家，由「P」類輸出管制國提升爲「V」類，可享受與某些北大西洋組織會員國相同的待遇²²。十一月十七日美國國務院和商務部宣布對中共科技轉移的新綱要。這項科技轉移，目的在促進中共的經濟發展及軍事防衛能力，並限制轉移第三國²³。這顯示美國仍然認爲一個「強大、安全、進步」的中共，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²⁴。

然而，我們注意到中共對波蘭、福克蘭島及其他國際問題多與美國立場相左；在格瑞那達問題方面，更直接抨擊美國「侵略」，其態度與蘇聯及古巴並無二致。對於美國自季辛吉以來就異常關注的、與東北亞安全有關聯的「交叉承認」問題，即美日承認北韓，蘇聯、中共承認南韓，以緩和朝鮮半島緊張的問題，錢其琛對日本「時事通訊社」訪問團團長大畑忠義說：「現在沒有

註²⁰ 臺北：(中國時報)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 第一版。

註²¹ 香港：(文匯報)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第一版。

註²² 臺北：(中國時報)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第一版。

註²³ 臺北：(聯合報)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第一版。

註²⁴ 臺北：(中國時報)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四日) 第一版。

交叉承認這種說法，中國和南朝鮮（韓國）沒有任何關係，也從沒有考慮到承認問題^⑳。在日本「讀賣新聞」舉辦的美國、日本、中共、蘇聯國際問題專家座談會上，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附設「美國研究所」所長李慎之說：「從中國（共——下同）方面看來，交叉承認沒有可能性。長期以來，中國就為美國的政策所苦。中國反對將國家一分為二」^㉑。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一項有關「臺灣前途」的決議案。當天，「新華社」即加以抨擊。十七日「新華社」發表記者述評，十八日中共「外交部」部長助理朱啓禎召見美駐平「大使」恒安石，並遞交一份「抗議照會」，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指此決議案是「十足的霸權主義表現」，且指「這一嚴重損害兩國關係的事情竟然發生，美國政府是難辭其咎的」。廿五日，朱啓禎再召見恒安石，就美國參眾兩院分別於十七及十八日通過一項撥款法案，支持中共申請加入亞洲開發銀行，但表示中華民國必須保持會籍，照樣提出抗議。

一九八三年九月趙紫陽接受美國記者訪問，談話內容有些與中共對美政策有關。關於購買武器問題，趙紫陽說：如果美國願意賣，「我們」又有需要而且有能力買的話，也不排除向美國買「一點」武器的可能性。但是，他指出，在國防現代化問題上，中共主要是靠「自力更生」。他說，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是「不能」靠購買武器來實現國防現代化的。在同美國進行戰略合作的問題上，趙紫陽強調指出，「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們」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者大國集團。「中國」對待每一個國際問題，都根據它的是非曲直來「獨立地決定自己的立場」。對於科技轉移問題，他說，「中國」一向把技術轉移問題不是作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作為「中」美雙方能否建立相互信任的問題來看待的^㉒。

趙紫陽所說，代表中共對美國的基本策略立場：在「臺灣問題」上爭吵勒索，在國際爭端中自行其是，在雙邊關係上，即使是購買武器與科技轉移，也慢吞吞地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那是標準的玩牌姿態。

六

中共對美態度的改變，與布里茲涅夫塔什干講話後北平與莫斯科關係的發展有關。中共對日本的態度轉變亦復如是，而其軌跡更為明顯。

如前所述，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頭，中共曾強烈要求日本增加軍費。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布里茲涅夫塔什干講話之後

註⑳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一日）第七面。

註㉑ 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三面。

註㉒ 〔新華社〕（一九八三年九月廿七日）北平電。

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的報告中說：「現在日本有些勢力還在美化過去侵略中國和東亞其他國家的史實，並且進行種種活動，妄圖復活軍國主義」。十一月間，廖承志對小川平四郎率領的日本亞細亞交流協會代表團聲稱：中共對美日安保條約既不支持也不反對³⁴。進入一九八三年，中共的態度是要「日本應把軍事能力限制在防衛需要的範圍內」³⁵。同年八月十八日「新華社」發自東京的報導，由於日本政府以中曾根首相為首的十五名內閣大臣參拜了靖國神社，引起日本各界及輿論的警惕和不满，認為同年的「八、一五」是「逆流中的八月十五日」。該社並引述日本「每日新聞」的社論說：「如果日本忘掉過去侵略戰爭的罪行，被周圍國家指出有復活軍國主義的危險，那麼在道義上就很難說是一個清白的國家」³⁶。八月廿日「新華社」記者述評，指日本修改憲法的活動以及上述參拜靖國神社等等，表明了今年日本少數企圖復活軍國主義的人的活動和對日本政治的影響超過了往年³⁷。廿一日「人民日報」又對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政治逆流」大肆抨擊。九月廿九日胡耀邦對日本社會黨訪問團談到中共日本的關係時說：「（日本）保有自衛力量是沒有問題的。但始終應該是國防而不是國張（擴張），超越自衛與國防的範圍是不可以的」³⁸。與前此的中共態度相比較，這改變是夠大的。中共目前在要求蘇聯削減其部署在遠東的SS-20飛彈方面，與日本態度尚稱一致。但依胡耀邦的表示，中共現今也希望日本和蘇聯改善關係³⁹。那和以前的中共是多麼不同啊！

然而，中共不會降低它同日本的關係。胡耀邦於一九八三年九月五日晚，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日本外相安倍晉太郎等六位日本內閣閣員時說：「到本世紀末時，中國的經濟將為現今規模的四倍，希望日本和中國的經濟關係也增加到四倍」⁴⁰。很顯然，中共對日本的關係是着眼在「錢」上。用中共的最新術語說是「向錢看」。

一九七八年華國鋒重新提出「四化」問題，希望大量引進外資及技術設備，其第一個目標就是日本。雖然一九七九年二月廿二日，中共宣布中止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以來，它與日本各公司簽訂的廿二項購買日本工廠設備的合同，使日本廠商大受打擊，但雙方的經濟關係並未因此低減。

自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三年，日本給予中共的第一次日圓貸款計三千億日圓。中共向日本提出的第二次日圓貸款要求，最初傳

註³⁴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七日）第一面。

註³⁵ 八路透社V（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九日）北平電，臺北：〔聯合報〕（同月廿一日）第一版。

註³⁶ 香港：〔文滙報〕（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九日）第二版。

註³⁷ 香港：〔文滙報〕（一九八三年八月廿一日）第二版。

註³⁸ 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第二面。

註³⁹ 一九八三年十月五日胡耀邦會對日本「社民連」代表田英夫作此表示。日本：〔朝日新聞〕（同月十四日）第四面。

註⁴⁰ 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九月六日）第二面。

說是一兆四千餘日圓，現已降至四千六百億日圓，但仍較第一次高出很多。日本輸出入銀行自一九七九年以降，給予中共融資二十億美元，中共現今又請求融資三十億美元。另據中共方面資料，從一九七二至一九八二年的十年間，中共和日本雙邊貿易累計總額達五五四億美元。日本和中共合資在中國大陸經營的企業廿一家^{④③}。不僅深圳要聘請日本銀行家任特區發展顧問^{④④}，歡迎日資在深圳設廠^{④⑤}，連內蒙古自治區也邀請日本長期信用銀行從事四個項目的經濟合作^{④⑥}。胡耀邦還希望日本派遣退休的技術專家到中國大陸服務^{④⑦}。

本文脫稿時，胡耀邦還在日本訪問。他此行自有其統戰目的，但不論他的訪問是成功或失敗，又不論他以中共總書記身分，能否和日本簽署什麼合同或議定書，但「錢」、科技問題、企業管理等等，必然是他的注意所在，不會不找機會提及的。

七

八十年代的國際政治舞臺，仍是以牌局開始。蘇聯現今已不再抨擊中共與帝國主義勾結，而是用「美帝是中國的兇惡的敵人」^{④⑧}或「中國頭上的武士刀、利劍」^{④⑨}等等詞句，渲染美國、日本過去、現在都「侵略中國」。蘇聯不再指美、日、中共搞三角軍事聯盟，轉而指美、日、韓搞這樣的同盟，聲言「美日聯盟威脅中國」^{④⑩}，或指美國企圖把中共拉進它的亞洲戰略計劃內，迫中共「合作或者服從」^{④⑪}。對中共則從實務方面着手，逐漸增進雙方關係，但故意誇張雙方關係的改善。凡此都是分化中共同西方關係的手法，即使蘇聯有誠意與中共改善關係，也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可以實現的。目前蘇聯的做法，仍然帶有玩牌的味道。

中共當前對來自蘇聯的威脅感已逐漸淡薄，它不拒絕從蘇聯獲取一些小利益以增進實質關係，但故意沖淡「改善」的氣氛，用「三大障礙」為制動器，控制對蘇改善的進度，俾能使它不致引起西方猜疑，以免影響到從西方獲取經技援助。對美國則故示

註④①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二日）第二版。

註④②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十月廿日）第一版。

註④③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三年十月廿一日）第二版。

註④④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三年十月廿三日）第九面。

註④⑤ 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二日）第九面。

註④⑥ 蘇聯和平與進步廣播電臺（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華語談話題目。

註④⑦ 蘇聯和平與進步廣播電臺（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一日）華語談話題目。

註④⑧ 莫斯科廣播電臺（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六日）華語談話題目。

註④⑨ 莫斯科廣播電臺（一九八三年十月廿一日）華語短評，題目為「合作或者服從」。

冷淡，但不拒絕接受美國的資金與科技轉移以及與美商合作開發中國大陸資源。隨時又以「臺灣問題」等等減低華府與北平之間過高的溫度，藉以向蘇聯表態，並用「臺灣問題」為對美勒索的籌碼。對日本則故示親熱，以便要求貸款並籠絡對中國大陸市場抱有希望的日本商人，俾有益於中共的現代化。

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除了不願見中共和蘇聯復合外，似乎也不願見國際現狀有所改變，以免破壞平衡或引發戰爭，這種心理很可能被人利用。

如果說七十年代的國際牌局是對蘇聯有利，那麼，八十年代初期的牌局，顯然對中共有利。它對美國、蘇聯、日本，都是有收入，絕少支出。然而，這種局面是可能有變化的。現今中共同蘇聯、蘇聯同美國、美國同中共，乃至這些國家同日本的關係，都已今非昔比，各方在接觸過程中，觀念、利害都可能隨時有所變化。而且，蘇聯的安德洛波夫，中共的鄧小平，究竟還能生存多久？在位多久？一旦他們死亡，又該有什麼變化，誰又能逆料呢？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九日脫稿）

蘇 聯

本書主要內容包括簡史、地理、黨政、外交、經濟、社會、教育、科技、軍事、國安會、西伯利亞及異議份子等各篇。全書約卅餘萬字，六〇〇頁，廿五開本，全一冊。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一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郵撥：三四三六號帳戶